

•探索与争鸣•

中国体育大型运动会多了还是少了？

编者按：我国体育大型运动会的确不少，按 4 年的运动会周期来算，几乎每年全国都要开 3~4 次。为此，地方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疲于奔命，人民群众应接不暇，一大批非职业的“职业”运动员不断改变身份混迹其中而忙得不亦乐乎。毫无疑问，这些赛会的举办都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意义，并在一段时间发挥重要的价值和作用。但在今天，这些赛会的合理性备受质疑。2011 年 10 月 28 日《人民日报》记者许立群质疑“大型运动会是不是太多了”。在 2011 年 10 月举行的广东省第二届农民运动会，深圳市没有组队参加，称没有农民不搞形式主义。面对这些现状和质疑，编辑部邀约了几位学者展开笔谈，探讨中国体育大型运动会是多了还是少了，希冀从中可以寻觅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路径。

中国体育不能泡在运动会里

卢元镇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全国性大型综合运动会开得最多的国家，除去已经中断的全军运动会、全国工人运动会、全国青少年运动会，还保留有全国运动会、全国体育大会、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全国农民运动会、全国城市运动会、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全国残疾人运动会，近年又发展出全国老年人运动会、全国智力运动会、全国冰雪运动会、全国水上运动会、全国大漠运动会。按每种运动会 4 年一个周期算，每年至少要举行 3 个全国性大型运动会，加上组团参加奥运会、亚运会、青奥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以及应付世界性的杯赛、锦标赛，政府体育部门几乎就是泡在运动会里，一个运动会刚结束，下一个运动会的动员、誓师大会又紧锣密鼓地运作起来。

体育泡在运动会里的后果显而易见：

首先，造成体育资源的严重浪费。每一个运动会都伴随着一批高标准的体育设施的建造。中国现在具备可以开展国际水平竞赛活动的场馆有 6 000 余个，堪称世界第一。广州开过两届全运会、一届亚运会，每次都要新造一批场馆。沈阳正在准备举行第 12 届全运会，才修好不久的运动场又要推倒重来。随着各地争办运动会的热情不断升温，上述数字还会继续增加。当这些设施的建设与地方官员的“形象工程”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更是相互攀比成风，而运动会后大都成为地方政府难以卸载的包袱，不少场馆体育部门难以经营自养，只好交还给国资部门管理，造成国有资产

的严重浪费。

我国大型运动会大多开得十分华贵。兴师动众的开闭幕式文艺表演、张灯结彩的街景布置、规模盛大的烟火晚会、动辄万人的志愿者队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官员多要住高档宾馆，开出的都是一张张令人咋舌的账单。运动会期间还要举行各种文化活动、科学报告会，更增加了主办方的负担。至于因运动会而停工停产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以及学生停课、中断交通等等都干扰了城市的正常生活。

其次，造成体育价值观的扭曲。“淡化金牌意识”的话题，已经讨论了多年，但“金牌大战”愈演愈烈。其根本原因是，我国的大型运动会都是以省、市、自治区政府名义组团参赛，为了一枚全运会的金牌，少则投资几百万，多则耗费几千万，因此“金牌意识”的形成和日炽，实际上是因政府对获取金牌所做高投入追求成本回收的心理使然。也因此，在运动会上，参加者为获得金牌不择手段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由于金牌和金牌背后高额奖励的催动，这些运动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不高，对体育发展和社会促进的作用也有限。各种事件经常发生，常常被社会舆论诟病。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现在这种运动会体制已经造就了一大批非职业的“职业”运动员，在各种运动会上他们不断改变身份混迹其中。于是就出现了农运会上不是农民的运动员，牧民运动会没有牧民的运动员，少数民族运动会变成了少数民族运动项目的汉族运动会的种种奇怪现象，而大学生运动会则成了一批非大学生的专业运动员鹤立鸡群的场所。

再次，造成体育改革的严重滞后。周而复始、花样繁多的运动会，使体育部门无暇思考体育的改革、体育的发展战略、体育的法制化建设，于是短期行为长期化，急功近利常态化成为体育工作的特点。保金

牌甚至成为拒绝改革的借口,当运动会上的金牌数量上升为体育系统的GDP时,全民健身只能沦为运动会的陪衬品;发展体育产业只能成为开运动会的集资方式;国民体质下降问题,特别是青少年儿童的体质健康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传统上主要用运动会办体育,给了人们这样一个命题:竞赛是杠杆。今天,国家已经强大富庶起来,不再需要用运动会和金牌来证明经济的实力和展示国家的崛起。特别是要从金牌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体育的增长方式必须发生重大的变革,仍然靠竞赛这种单一的方式来推动,显然难以实现体育的全面、协调、高效的发展。

竞赛体制的改革应该成为下一轮体育改革的切入点和杠杆。第一,全运会体制必须做相应的改革。在奥运会后一年举办的全运会,除了重复奖励奥运选手的意义外,对体育工作的实际推动价值不大。世界各国体育发展的模式不同,但完全按照奥运会照猫画虎的国家极少,即使是体育高度发达的美国,对奥运项目的选择也是考虑本国国情的。全运会的设项要大大精简,要以竞技体育的核心项目为主,如田径、游泳、三大球和其它国内公认的有普及基础并开展较好的项目。其它项目转入单项竞赛或职业体育,项目的去留,前者由公众做选择,后者由市场做决定。

要增加单项的和区域性的体育比赛以取代大型运动会。单项体育比赛动员人力物力较少,可避免繁文缛节的仪式活动,社会成本较低,对城市社会生活干扰也较少,选拔运动员的功能可以充分得到体现。这些单项体育竞赛活动可以让单项运动社团来组织管理,以推动体育社团的实体化进程。一些在全国不能也不必普及的运动项目,如马术、冰雪、沙漠、水上项目等多举行区域性比赛,防止不具备条件的地区为了谋取金牌盲目开展,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第二,国家要立法,对全国性运动会开闭幕式的规模、人力、物力和资金投入,对新建体育场馆、体育中心的规模、规格进行严格控制,防止相互攀比,不断升级。要制定新的评估系统(如全民健身评估),全面考核、评价各省市自治区的体育工作,防止以金牌决定体育政绩。

第三,全民健身活动要摆脱举行大型运动会的“路径依赖”。要将一些群众性的运动会,推向“体育节”的方向发展,以全民健身为目的,如全国体育大会、农民运动会,可以由全国统一管理,分散在各地,拉长时间举行,以促进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

为推动老年人体育的开展,适度的体育比赛是必需的,但让老年人长途跋涉,长时间改变生活习惯,

并参加激烈的金牌竞争,并不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一旦出现伤病事故,影响极坏。因此老年人运动会重在本地社会参与度而应基本不出省。

第四,要允许大学生组团进入全运会。在世界各国大学生都是竞技体育的参与主体,唯有我国将大学生排斥在选拔竞技体育人才的门外。我国高校具有优良的体育设施,又有高科技的支撑,由大学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可以有效解决我国运动员来源、出路、文化教育等一系列长期棘手的问题,也可以冲破竞技体育高度封闭的现状。将大学生隔离于全运会之外,实际上是对部门利益的自我保护。但是中学生的体育比赛最好限于省内,过早参加全国比赛容易忽视文化课学习和基础训练,人为拔高成绩会造成“早衰”,且年龄、学籍作弊也不易控制。

城市运动会是当年全国青少年运动会的变种,是人们心目中的“第二全运会”,由于金牌意识越来越浓,选拔人才的功能越来越差,现在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成分十分混杂,水平参差不齐,身份造假问题突出,是一个意义不明确的运动会,应予以取消。

第五,运动竞赛最终必须走进市场。一些人之所以那么热衷搞大型运动会,就是因为这些运动会都是由国家掏钱买单,自己不必担心亏本。如果运动会真正像影视、戏剧、出版等文化行业一样进入市场,由市场来汰劣留优,恐怕他们就要对运动会的数量和规模合计合计了。这大概是解决我国运动会泛滥成灾的根本出路。当我们不再“端着金饭碗要饭”的时候,中国的体育竞赛就彻底摆脱了“虚胖”,真正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高度繁荣。

中国体育的运动会问题

狐鸣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中国体育,盛也运动会,衰也运动会。

想当年,新中国成立不久派大队人马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因政治原因愤而退出国际奥委会,中央成立专门的部委,卧薪尝胆20年,靠乒乓球打出国门走出四面楚歌的困境;又过了10余年,终于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在国际体坛扬眉吐气!改革开放以来,多少个中国人登上世界级运动会的最高领奖台,多少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多少次义勇军进行曲激昂奏响!最难忘的是女排五连冠,使百废待兴的神州大地四处响起“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声音……体育为

“文革”后极度疲惫的大陆打进一剂强心针以凝聚涣散的民族自信心，这个注射剂就是通过大型运动会的比赛获得的。

在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中国体育通过各种大型运动会空前(也可能绝后)膨胀，形成了体育等于运动、运动等于竞技、竞技等于奥运会、奥运会等于金牌的简单化思维，最终竟自我拔高为像“两弹一星”那样的尖端工程，臆想了一个不太靠谱的提法即所谓“举国体制”，并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奥运争光计划》，集中所有的优质体育运动资源消耗之。多年下来，中国的体育管理部门就只需办运动会、只想办运动会、只会办运动会了。

大型运动会太多太滥的根源是体制弊端。培养优秀运动员参加运动会参加比赛，这是我国体育工作的核心，围绕这个核心形成层层集训广种薄收，并通过运动会多次选拔淘汰最终剩下极少竞技精英代表国家或省市参加运动会的模式。围绕这个核心构建的庞大行政管理及后勤保障体系，终成畸形体制。即便有大批低文化水平、弱生存技能的退役运动员已造成社会负担和困扰，“举国体制”仍然要继续坚持；即便运动会腐败丑陋劣迹斑斑已成为行政官员糊弄政绩的“面子工程”，经费投入已产生边际效应，“举国体制”仍然要强化；尽管全社会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少年体能水平持续下降甚至国民体质的最新测量数据也在恶化极为不满，体育界的理论盲者仍然在鼓噪“举国体制”的“完善”，其结果之一就是被地方官员们用来满足打肿脸充胖子的政治虚荣心而不择手段窝里斗得劳民伤财的巨型运动会此起彼伏。

改革开放 30 多年后，中国已成为举足轻重的全球经济大国；但国富而民弱，成为中央领导层高度关注并正在积极解决的问题。体育界盯着运动会埋头苦干多年，却不觉国人皆已醒，当年什么都不行的时候靠运动会上取得优异成绩来吸引世人眼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运动会上干掉对手就等于意识形态高明、社会制度优越，而输掉一场球赛就等于丧权辱国可羞耻至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的弱者心态也已成笑柄。中华民族无需再靠运动会来提虚劲。

想起前不久卢元镇教授转发一则笑话，大意是一群正在洗浴者从突然失火的澡堂里冲到人群熙攘的大街上，不少人忙不迭捂住羞处，忽听一声老练者提醒：“捂住脸！下面都一样……”这有点像中国体育目前的尴尬心态，虽然像鸵鸟钻沙堆顾头不顾腩，但有了金牌就有了面子，“一金遮百丑”！体制内的利益捍卫者千方百计保住原来的格局，还想着只要努力拿到更多的金牌，什么都好交差。姑且不论下一届伦敦奥林

匹克运动会是否还有一丝的可能超越已有战绩——回头看看：上次奥运会都世界金牌第一了，怎么还说不不是体育强国？

如果我们不把体育仅仅视为人体运动的物理位移，不仅仅是埋头训练善于参加运动会的锦标工具，那就应该将其视为人类创造的文化，尊重体育的人文价值。文化的重要特征，除了后天习得，还应该是众人共享的。如果不能分享运动，那么“体育”最终可能萎缩于极少数人垄断把玩的畸形阴影中。中央早已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关注民生、普惠大众，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体育活动，很明白地成为中国体育转变发展方式的导向。下决心改革体制，精简大型运动会，那是必需的。

回忆中国体育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置身于一系列轰轰烈烈运动会的极盛时光，好似在天堂——可惜天堂非凡人久留之地，脚踏实地才能常驻人间。愿中国体育看清天上人间。

体育盛会申办潮应该减弱

金沙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体育文化研究中心，北京 100101)

中国近年来已经成为全世界举办大型运动会最多的国家。2008 年北京奥运会堪称一次无与伦比的“极品”，之后有广州的亚运会、深圳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以及还要举办的南京青奥会。除了全运会，还有农民运动会、城运会、大运会、中学生运动会、少数民族运动会等及一些国际性的单项赛事。这些运动会让世界领略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惊人速度。每一次大型运动会从开幕式到比赛的进程，无不体现了中国举办大型运动会的投入、认真、恢弘、严谨和不惜工本。当国内媒体转载一家英国报纸盛赞“只有中国最有能力举办世界性运动会”后，很多网民不认为这是在表扬中国，有人质疑“这是好话吗？”如果中国还在贫穷的时候，这应该是给国人提气的好话；如果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助推器时，就应该让国人做深一层的思考了。

举办大型比赛是中国人蓄之已久的情结，多年的弱国心态和“东亚病夫”的羞耻，被国际体育组织排除在外的孤独，更让中国人要利用大型运动会向全世界显示凛然不可侵犯的志气，从半个世纪前开始的全运会、第 26 届世乒赛，到改革开放后的北京亚运会、世界女足锦标赛、北京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都体现了

这种志气,而且取得了常态下不可能达到的轰动效应。

但是随着北京奥运会把中国举办大型运动会推到极致,在中国接连举办几个国际盛会,让人们有了另一种思考。不少人提出,京沪穗成功举办奥运、世博、亚运等国际盛会后,地方大中小城市亦争相掀起申办各类体育大赛的热潮。为追求城市形象和轰动效应,各地不惜血本,动辄豪掷千亿公款操办仅持续十几天的赛事,为此要新建现代气派的体育中心、举行歌颂盛世的超大型开闭幕式、大兴土木突击城市建设……这些眼花缭乱的场景的确在短期内给城市添彩、引起中外关注,但同时也给举办地日后相当长时期内背上不堪承受的经济包袱。

其实举办大型运动会历来存在很大风险,把体育产业已经做大做强西方体育强国几乎从不举办有亏损风险的运动会,国外那么多城市对于只追求影响没有经济效益的运动会失去了兴趣。即使城市的管理者有意,制度也不会允许,在那里花纳税人的钱绝不是几个人拍板说了算的。而我们由于有相当经费用的是国库里的钱,经费总能不断追加,编制可以不断扩大,实在不行就向上伸手向下摊派,于是也就不大顾及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仍然没有抛弃计划经济甚至“战争思维”的后遗症,即“集中优势打歼灭战”“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不惜一切代价获得胜利”。而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可以有多种选择,其核心是市场效益的最大化。我们应该把运动会乃至体育产业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让举办运动会通过立法受到严格科学的论证和监督。

正是由于未能把举办大型运动会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纵观以往的大型运动会,基本每个主办城市最后都是赔本赚吆喝。因为在职业体育尚不发达、赛事资源严重匮乏的中国,高额投入的体育设施在赛会之后闲置,大多无法为普通百姓所享用,还需支付天文数字的维护成本,令主办城市不堪重负。南京为举办“十运会”在城市建设等方面就花了 1 150 多亿元;“十一运”东道主山东更甚,为此累计投资 2 000 亿元以上,这笔投资包括了城市和场馆建设、道路交通等支出。其中仅济南一市,就投入了 1 400 多亿元进行城市改造。山东为“十一运”共新建场馆 42 个,维修改造 88 个。主场馆——济南市奥体中心每年的维护费用约 3 800 万元,眼下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参观游览和提供健身场地,但仍有高达 2 000 多万元的开支缺口要靠政府补贴;专门新建的赛马场地耗资 4 亿多,而由于赛马场地专用性强和赛马缺乏群众基础,赛后这个场地基本闲置。去年的广州亚运会大大超出预算,广州亚运会和亚残运会共投入超过 1 200 亿元,有人指出,

这个数额不仅比原先 20 亿的预算翻了 50 倍,更高于 2012 年伦敦奥运会的 90 亿英镑预算。而广州的人大代表则质疑,在历年的政府预算报告中,亚运会的开支从未有过专项资金的报告,这也使得人大代表们“搞不清楚每一笔钱究竟是怎么花的”。

运动会已经过去多日,但留下的亏空一直没有消停。在 2011 年两会上,广东代表钟南山在分组讨论时透露,亚运总投资实际为 2 500 多亿,其中广州投资 1 900 多亿,带来债务 2 100 多亿。他希望中央、省里给予广州必要的扶持。也有人分析,这是钟南山为广东省向中央求援。但是之所以难以获得同情,在于其操作过程很多是明知故犯。广东省审计厅在 2011 年 11 月 25 日下午在其网站公布了《2010 年广州亚运会和亚残运会财务收支及场馆建设项目审计结果公告》,8 个场馆建设被审计出存在设计或服务及材料采购未进行招投标或政府采购的问题,部分场馆工程被查出违规转包分包。审计还发现,8 个亚运场馆在建设过程中,有关施工单位违规将部分工程转包分包,涉及金额 2.2 亿元。广东省建设主管部门已对此进行了查处,对 9 家违规转包分包的企业依法进行处理。几乎同一天,《扬子晚报》披露,2005 年,南京为十运会耗资 3 000 万元修建皮划艇激流回旋赛场,该赛场在十运会结束后仅于 2006 年和 2007 年短暂开放过数月,之后闲置至今。该赛场所所在的白马公园相关负责人表示,赛场已长期无人看管,赛道已经干涸。耗资 3 000 万元的南京皮划艇赛场,是当时亚太地区唯一能达国际标准的一流场地,南京有无必要建如此高标准的场馆,显然是值得斟酌的。建的时候抢破头,管的时候甩包袱,几乎成了管理部门在大型运动会前后的定势。这一系列令人惋惜的巨大浪费再一次惊醒人们,为防止权力集中带来的决策失误,不妨由地方人大组织专业人士,为大型赛事场馆建设把关,从场馆立项、设计、规划、选址,到再利用方案的拟定和执行,全程参与。

值得我们借鉴的是,去年香港举办的东亚运动会开幕式和广州亚运会的开幕式都由同一个机构——北京北奥公司承办,但前者花费 8 000 万元左右,后者则是 2 亿多元。香港本也准备举办 2023 年亚运会,但立法会多数委员认为港府申亚存在费用预算混乱、没有清晰交代巨额开支如何使用等问题,预算虽然仅几十亿却没通过。不客气地说,中国现在的很多大型运动会都是“劳民伤财,好大喜功”,其背后是主政者一种病态政绩观作祟。

中国举办大型运动会的通病是最关注标志性主会场,不求实用只求最好,不管后续利用,只需昙花一

现。一方面我们的不少城市拥有世界一流体育场馆闲置，另一方面可供老百姓锻炼的场馆却越来越挤。在大型运动会世界第一的背后，是人均拥有体育场地少得可怜。同样建造体育场馆，52年前的联邦德国搞了个“黄金计划”，他们修建了67 095个体育场，绝大多数都是针对普通百姓尤其是学生的，如露天游泳场和室内游泳馆、中等规模的运动场所、儿童游乐场，并立法规定供学龄前儿童、在校学生、成年人、协会组织成员4类人使用，而不盖那些虽然壮观却成为摆设的运动场馆。德国除去办奥运会、世界杯、欧洲杯这些影响力巨大并有经济前景的赛事，绝不办为了形象劳民伤财的运动会。

在2011年4月份举行的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提出合理控制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节奏和规模，不要超出自身能力申办，并强调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避免过度建设和闲置浪费。这是中央层面首次明确叫停地方申办体育赛事的“大跃进”，可谓切中时弊。今后不仅要狠刹体育赛事奢华风、攀比风，更要将巨额预算的决策、使用、监督纳入制度控制，从而保证公共财政的公开透明、不被滥用。这也许会意味着那些好大喜功的运动会少些？但愿！

中国运动会“恐龙时代”的终结

马廉祯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英国评论家莱恩·米尔斯(Lain Mills)在2010年广州亚运后，于《世界政治评论》撰文探讨这些年中国对大型赛会的狂热热衷，文章这样写道：“众所周知，这些大型活动被证明对于草根阶层而言获益甚少，但仍无法被实质性的基础改革所取代，尽管连中国政府也承认这些改革是这个国家现代化所必须的。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对大型赛会的热衷很可能会损害中国的长期发展，并最终导致老百姓对国家的感受与国家宣传所塑造的那个红旗飞舞的市场经济乌托邦之间差距的不断增加。”米氏这段语气沉重的分析代表了2008年奥运后海外媒体看待中国办会热潮的基本论调，那就是地方政府对政绩活动的热衷已影响到国内民生的改善。与此同时，国内与之相类似的论调也与日渐增，从温和的倡导节俭办会，到激烈的主张废除全运会体制，警示、批判之声此起彼伏，将中国运动会的发展推上了风口浪尖。

诚然，作为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特别是一个意

识形态有别于多数国家的文明古国，举办奥运会、亚运会等大型国际赛会不仅是国力的象征，是树立国际威信的需要，更是凝聚国民自信心、激发民族自觉的重要途径。但近些年中国对此类活动的热衷，无疑已超越了理喻的范围。超千亿资金的基础投入，超5万座位的主场馆建设，超25万m²的新建场馆中心区规划，过亿花费的开幕式表演，几近成为2005年十运会后，各地办赛的门槛，致使近10年来，一场场不是“前所未有的”，便是“史无前例”的超大型运动会接踵而至，引领着中国运动会发展迈入“恐龙时代”。

粗略计算，仅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南昌七城会、贵州九民运4会的财政投入总额就约为6 500亿元，这竟然与2011年全国高铁投入总额相当。不同的是，这边是12条高速铁路的建成使用，新增里程4 715 km，而那边则是总共35天、前后10余场文艺晚会，和47座新建场馆的热闹。其中，贵州为此次民运会新建的贵州奥体中心建筑群总投资将近20亿元人民币，而这一数字竟与贵州全省“十一五”规划专项扶贫资金的年均投入不相上下，这叫全国贫困人口数量最多的贵州省情何以堪！这种近乎歇斯底里的赛会繁荣与我国青少年体质30余年连续下降、大众体育发展速度缓慢、职业病危害加剧、传统体育流失等诸多问题形成鲜明对照。当开幕式耀眼夺目的灯光与焰火燃亮刹那，横置于“体育强国”与“体育大国”之间那本已无从遮掩的差距，被映射得更为突出。

从价值理性的角度来看，运动会受其所处社会的文化、宗教、政治、伦理认识等因素影响。体育竞赛所宣扬的价值准则与行为规范，往往就是社会普遍价值与规范的对照与反映。现代运动会源于西方，随工业革命的步伐迈向全世界，它所倡导的价值观，如自由、平等、公正、积极向上、规则等，无不是当今社会发展普遍采纳的价值认识。在一个充斥着猜疑、不明确与复杂性的世界里，运动竞赛的结果却分外的简单而明了，这里成功或失败一目了然，任何微小的差别都通过精确的数据得以体现。纪录被打破、排名被刷新，今天的胜利者成为明天的失败者。如顾拜旦所言，在物欲横流、复杂多变的世界里，运动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化的空间，这里规则是明确的，而努力与付出都会获得奖励。这正是体育竞赛的魅力，更是体育竞赛的责任。所以，运动会自诞生起就背负起强烈的社会教化与社会导向职责。正因为这样，《奥林匹克宪章》将基本原则的第一条定为“奥林匹克主义谋求把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合起来，创造一种在努力中求欢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从这一点来看，运动会

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确保体育竞赛的顺利实现。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条件下,最大限度保证运动员对于竞赛规则的忠诚,使体育竞赛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终极价值得以彰显实现,这既表现了现代体育对生命力的追求,也是体育人本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而体育竞赛以外的其他内容无外都是可有可无的附属品。

然而,自现代运动会诞生以来,它所具有的这种教化与导向功能就一直无法摆脱外部世界的干扰。这是因为,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运动会同样是达成某种目的的手段,如增进双方友谊、选拔优秀人才、展示国家实力、宣扬特定价值观等,这其实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实。事实上,早期现代运动会就是作为一种社会工具而诞生的。早期英国足球赛不过是政府舒缓社会压力的一种途径,顾拜旦复兴奥运会的初衷则是激发法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奥运会在冷战期间一直是东、西方阵营交互较力最主要的战场之一。但体育竞赛的工具化发展必须是有节制的,任何形式的过度应用都将使体育背负沉重的社会与文化代价。道理很简单,这里效率与方法占据了最为关键的位置,而与其相关的价值与成本问题却经常性地被忽略,整个过程的合理性完全可以通过目的的实现而获得正当化,用一句俗话说就是“宁肯牛累死,不叫车倒下”。这一点在中国当代体育的发展中也有深刻体现,尽管“举国体制”成本高昂,诟病不断,但在“金牌效应”的光芒下仍能得以延续,正是凭借着国家对竞技体育工具理性化发展的推崇与依仗。而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使经济工具理性在中国大行其道,特别是工具理性效率优先的逻辑模式,促使地方政府格外热衷于“集中力量干大事”式的高投入,与“立竿见影”式的高效率,不惜寅吃卯粮,甚至举债经营来制造地方经济发展的热潮,一时间“地标”、“名片”、“打造”一类词汇充斥于地方政府的发展规划书中。这使“举国体制”与地方政绩在操作模式和价值取向上一拍即合,从而迅速催生出近 10 年的全国大型赛事承办的爆炸式发展。自此,运动会不再仅仅是竞技体育的盛会,还要担负起改善地方基建、提高地方知名度、宣传地方文化、增强地方商业等许多重任,一个个令人咋舌的奇迹也应运而生。如 2004 年为第 13 届亚足赛修建的重庆奥体中心,总投资超 20 亿,这个可容纳 6 万人的体育馆创国内同类场馆建设工期最短记录,只用 18 个月就建成。与之相比,南京十运奥体中心体育场建设周期 28 个月,上海八运会体育场施工周期为 30 个月,广州九运会体育场施工周期为 33 个月。速度之快叫人不能不对建设质量心存顾虑。再如,2008

年奥运会张艺谋开启了中国赛会开幕式表演的“飞人时代”,时至今日“威亚”(空中悬吊表演技术)的大量使用已成为中国大型赛会演出不可或缺的内容,记录也一再被刷新。北京奥运开幕式“威亚”使用了 7 条,济南全运会竟使用了 98 条,而杭州残运会开幕式最长的一根直拉“威亚”竟有 320 m 长,离地最高处超过 90 m。广州亚运开幕式更是推出 160 根“威亚”的千人表演,美其名曰“挑战人类极限,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据报纸报道,表演第一天训练 23 个人,有 11 人下来时流鼻血,整个表演准备耗时三四个月,每天平均训练 10 小时,队员每天吊在空中平均 6 小时,拉绳的人每天平均来回跑 10 km,不少人在空中飞行后开始呕吐。而队员平均年龄 17 岁,最小 14 岁。凭良心说,这能是以人为本的奥运精神的体现吗?这些奇迹有必要去创造吗?

运动会结构从过去单一的体育竞赛发展为集众多文化活动为一体的庞然大物,泡沫化严重。五花八门的文艺活动扮演了当下运动会的主角,而体育竞赛自身却越来越不为人所关注。以深圳大运会为例,从大运会取得申办权始,到 2011 年 9 月 30 日大运会总结大会,仅由市文体旅游局组织的关键时点文化活动,就包括申办成功庆祝专场文艺晚会、贝尔格莱德第 25 届大运会闭幕式上的接旗演出、倒计时 100 天、30 天誓师大会大型文化活动、大运会总结大会文艺演出等,数量达 6、7 次之多。还有一些地方,甚至将本不适合相互结合的理念与形式也强扭为一体。以将于 2012 年 6 月在山东海阳市举办的第三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为例,举办方打出把赛事和城市文化品牌建设有机融合,打造“沙滩运动休闲名城”的口号。为此,主管副市长声称,要在海阳形成以地雷战景区、地雷战影视城、地雷战博物馆为代表的红色板块,与亚沙会、沙滩体育运动休闲山海呼应,特色突出的全新合作模式。“地雷战”竟可与“亚沙会”相结合?如此啼笑皆非的结合,着实令人捧腹不已。

据闻,中央对于地方承办大型国际活动,即将明确规范。原则上不再鼓励承办大型国际性赛事,同时国内赛事结构也可能发生调整。2011 年底在吉林召开的十二冬运会对此反应迅速,适时打出“量力而行,以人为本,务实高效,绿色低碳”的原则,力倡“节俭办赛”之风,首创国内大型综合性赛会无新建场馆的纪录。这是一个好兆头,说明中国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潮头已经抵达体育。在号称“中国计划经济最后一个桥头堡”的铁路系统都已被迫开始转型之后,中国体育没有理由不发生变化。特别是随着中央对地方财政债务监管的进一步强化及地方经济发展民意介入度

的不断提高，过去那种铺张浪费的大型体育赛事将逐渐淡出历史，中国运动会的“恐龙时代”也行将结束，而体育竞赛将回归体育、回归大众，让我们翘首期盼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大型运动会真的太多了？

黄璐

(河北理工大学 体育部, 河北 石家庄 063009)

近来网络口水仗此起彼伏，大型运动会太多太杂成为众矢之的。有砸锅卖铁的，有维稳的；有骂街的，有大唱赞歌的。好东西不嫌多，这是最简单的生活常理。大型运动会多了，国民反而不高了，这是哪门子道理？

竞技体育(Competitive Sports)，应区分为高水平竞争性体育和业余大众体育(Mass Sports)，进一步将高水平竞争性体育区分为职业体育(Professional Sports)和精英体育(Elite Sports)。体育学界很少在认识论、价值论、哲学、文化学、社会学研究中严谨区分出职业体育和精英体育这两个概念，习惯用模糊的上位概念。二者虽然在本质属性上表现同一，但在价值取向上却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存在与实践方式。古希腊罗马竞技代表了精英体育的文化精神，近代顾拜旦复辟的奥运会乃至体育传统，也是基于古希腊罗马竞技形态意义上建构起来的。与之相对应，文艺复兴与英国工业革命带来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精神结合人类运动形态，创造了职业体育的最初形态。国际奥委会及现代奥运会秉持更快、更高、更强的精英体育精神，国际足联及世界杯足球赛则一以贯之眼球经济和商业逻辑。诚然，这两个概念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对立关系，二者之间的重叠部分、联系与互通性亦较大。例如西甲联赛竞技水平与西班牙国家足球队竞技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再如英超誉为世界足球职业联赛顶级市场，而英格兰队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赛上却未能晋级八强，这表明一个国家职业联赛发展水平与这个国家足球队竞技水平之间不能简单划等号。这里只是想通过简化概念达到有效讨论的目的。

二战后，两大政治集团对抗激烈，西方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资本主义阵营始终把利益最大化与商业主义逻辑摆在赛事发展首要位置，亦是一个“原始资本积累”的赛事品牌成长期。不具有商业潜质的、非职业化的赛事发展停摆，奥运会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最后的结果众所周知，以1984年洛杉矶奥运

会为标志，奥运会还是走上了职业体育的发展道路。这里大家会提出质疑，1984年之后的奥运会同样秉持顾拜旦理想主义和古希腊竞技传统，怎么会是商业主义驱动的职业赛事。这里举两个例子。第一，耐克、阿迪达斯在中国设有代工厂，为什么中国能生产同样质量的运动产品，却卖不出同样的价格。第二，北京奥运会证明中国有条件办国际一流赛事，为什么中国本土没有国际知名赛事。我们往往归结为品牌成长问题，那么赛事品牌又是怎么生成的。首先必须在战略与文化层面上去定义一个赛事，创造一个全新的概念，建立一个历史的神话。同样质量的产品，穿“阿迪”就是“酷”，穿“李宁”就是“土”。同样性能的手机，拥有iPhone就是时尚与身份的象征，拥有“中兴”就是不入流。奥运会很巧妙地应用人类普适价值的身体表现形式，建立赛事的神话体系和群体认同，在日趋同质化与白炽化的国际赛事竞争中脱颖而出，本质上是赤裸裸的商业主义，以普遍主义的名义来为西方价值体系的特殊利益辩护。

以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为拐点，奥运会必须为推行商业逻辑寻求一个恰当的理由，在经济与文化政治层面上引起世界诸国的兴趣，有人气就有市场，商家才有发展空间。雅各布斯(Jane Jacobs)将神话定义为一种保守主义，总是回头找寻基本教义信仰的引导，并引以为世界观。很难想象如果不是乔布斯致力于人文与技术完美结合的文化经济理想，苹果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很难想象如果奥运会没有独树一帜的神话传统与价值体系，这样一个大杂烩的赛事会是什么样子。正如杰姆逊尝试把握后现代文化经济基本逻辑的那句名言：“经济的生成文化的，文化的生成经济的。”也正是美国正在做的事情，用抽象的文化符号，换取中国实实在在的资源与劳动。在这层意义上，奥运会的内在本质已今非昔比，顾拜旦复辟古奥运会的精神文化遗产，主要在建构赛事的概念、神话与群体认同层面上使用，奥运会商业主义披上了华丽的外衣，成为后现代文化经济、后殖民主义与新商业主义实践的一个生动案例。

冷战后，资本主义像病毒一样在全球蔓延，利益最大化的根本诉求散播全球，赛事发展呈现两极分化特点。职业赛事迅猛发展，精英赛事日渐式微。国内学者注意到这样一种外在表现趋势，即西方国家主导的职业赛事，在向表演化方向延伸。只要顾客满意，商家才有机会。比赛并非单向度的追求技术与胜利，而是主张运动技术为商业主义服务。比赛指向身体审美与媒体狂欢价值，运动员更像是一名职业演员，在赛场上表演身体造型与动作艺术。职业赛事与精英赛

事的发展分化很大程度上源自运动项目内在性的规定,田径、游泳、体操、跳水、举重、乒乓球等项目被定义为不具有商业潜质的;足球、篮球、网球、橄榄球、冰球、赛车、高尔夫球等项目被定义为具有商业前景的。现在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状况,具有商业前景的项目赛事更加商业化,不具有商业潜质的项目赛事在积极转向商业主义。在赛事商业化方面,世界诸国以极大的热情与资源投入,商业竞争日趋白热化,发展中国家的禀赋优势逐渐淡化,不得不面对赛事商业边缘化的境况。

这里大家又会提出质疑,难道精英赛事就失去应有的价值了吗?显然不是。美国同样热衷于举办各种不具有商业前景的精英赛事,如区域性赛事、公益性赛事、各单项全国大学联赛、校际友谊赛、校级联赛等,各级各类比赛繁多,处处洋溢运动的气息,这些比赛技术水平一般,观赏性较弱,为何不遭人诟病?这就是美国百年来一直努力在做的事情。美国在为它的国民提供一种竞技生活,创造难以忘怀的社区与家乡记忆;在为竞技参与者提供一种公平公正的信念,赢得国民对国家发自内心的信任与尊重;在为竞技赋予文化想象与神话内涵,创造现代国家的情感基础和团结一心的社会氛围。你会抛弃这样的国家吗?显然不会。冷战时期的东方阵营,可以是强大的苏联政治集团,也可以是柏林墙倒塌后的政治军事大国俄罗斯。从政治集团、地理范围和种族范畴来定义一个现代国家早已过时,现代国家是一种极富吸引力的社会文化氛围及其认同范畴,这便是沃拉斯指出的现代国家的存在本质,作为一个心灵的实体、一个抽象概念、一个象征、一个化身、一个归宿。现在中国的某些官员、富商在捞足“油水”之后,以及官二代、富二代们,大都移民去发达国家,或摇身变为双重国籍身份。你能说他们是“中国人”?如果不能有效运用特殊的形式,建构国家身份的想象与荣耀,中国高速发展之后将成为未来的全球“贫民窟”。艺术、电影、网络、赛事等文化形态都是这样的特殊形式,这就是美国一个世纪以来致力发展的大事件。

谈到这里,再回过头去思考中国办大型运动会的问题,许多疑问便迎刃而解了。中国用改革开放 30 年时间去追赶西方一个世纪的发展脚步,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事实上确实没法赶超。中国各单项职业联赛市场发展缓慢,具有世界影响的本土联赛品牌尚未确立,惟有申请引进“轮流坐庄式”(如北京奥运会)与“票房提成式”(如上海 F1 赛车)赛事稳住颓势。中国在列强竞争的国际职业体育格局中丧失话语权与“定价权”,徘徊在职业赛事产业链的中低端。中国真

正在做的事情,是在精英体育上有所作为,说得难听点,是在奥运会“软金牌”(低含金量金牌)问题上大做文章。依据营销学长尾理论,中国凭借举重、跳水、乒乓球、体操、羽毛球等诸多软金牌项目,组成销量庞大的“长尾”,以粗放式、高能耗的集团作战效应突破营销学的“二八法则”,历史性登基奥运会金牌榜首,这便是坊间盛传的“中国用职业运动员打业余金牌”。

暴风雨过后惊恐的民众,与迈入新世纪刮起的那阵“中国可以说不”、“中国崛起”的社会躁动一样,喊出了“中国竞技体育强国”、“中国体育强国”的口号。这个不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议题引起了体制内学者的极大兴趣。中国仅仅是一个奥运金牌强国而已,怎么偷换概念摇身变为职业体育强国,进而等同于竞技体育强国。更甚者步子迈了八丈远,干脆喊出“学校体育大国”、“大众体育大国”的口号。奥运金牌强国更不能与体育科技强国划等号,田径、游泳基础大项最能证明一个国家的体育科技发展水平,美国奥委会主席向媒体公开承认中国精英体育具有人力、体制和实际的训练方法优势,但对中国的体育科技发展问题保持沉默,就是这个原因。近代中国背负屈辱的历史,自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发轫,到新中国初期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搞原子弹、发展航空科技,中国人民太需要证明自己了。改革开放 30 年经济社会伟大变迁,让积压已久的民族情绪(以 1990 年北京亚运会为标志)得到无控制的释放(以北京奥运会为标志),转化为一种暴发户式的炫富心理,完全靠经济业绩与文化事件的显摆,来确认自己的国际地位,确认自己的民族自信与国家尊严,进一步掀起后北京奥运时期一线城市申办国际大型运动会的浪潮,如 2010 年广州亚运会、2011 年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2013 年天津东亚运动会、2014 年南京青奥会等。

中国在职业体育上建树甚微,在申请引进国际品牌赛事上难以获利,就只能把多余的精力放在表现精英体育的国内大型运动会上。这些大型运动会的商业前景黯淡,但却蕴涵群体认同乃至国家认同的巨大社会价值,即塑造共同的社区与家乡记忆,赢得国家的荣耀与尊重,夯实现代国家的感情根基,服务于中国统一战线。现实中的问题远比期待要尖锐,农民不“农民”、大学生不“大学生”,铺张奢华,效率低下,创意匮乏,审美疲劳,症结究竟在哪里?

东西方文化政治传统各异,西方以民主政治驱动方式为主,东方以集权政治驱动方式为主,进而体现为两种迥异的赛事发展动机模式。古罗马政权为获得自由民众的支持与忠诚,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和社会等级制度,大力推行发展角斗士竞技盛宴,成为一种奢

华的国民娱乐活动和大型的公共服务项目。这种政治与竞技间的实现方式，聚集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纵深植入西方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进程。上层建筑为实现选票政治的合法性，维护既有社会体制和利益格局，以最大的热情与动力发展职业体育，提供这种特殊的公共服务。最典型的案例是英国天空传媒集团收购曼联队事件，最终因球队忠诚与区域认同要素引发的球迷强烈抗议搁浅了，在公民对竞技的情感和球队的忠诚面前，金钱与政治的魔力黯然失色。

反观东方社会的集权模式，公民政治权利随意“被代表”，政治精英注重集权体制内的关系圈影响。陈云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说到点子上，官员只要得到“上面”的赏识与肯定，做足升迁所需的政绩形象工程，还管当事人或国家人民处于什么状况。现在的中国官员处境微妙，经济不景气(粗放增长严令禁止、结构调整阻碍重重)，高科技又费力，可利用的形象噱头实在太少，也只能动大型运动会的脑筋，为晋职升迁捞点光鲜。换作日本是什么状况？谁敢动国家之所以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感情根基这块大奶酪，就必然受到最为严厉的打击。日本足球的崛起是最有力的证据，足球重建了历史文化记忆共识，是大和民族团结一心的心灵纽带，帝国野心的马赛克。日本政治高层怎么会是一群乌合之众盗取国家最大利益集团的奶酪。如果中国官员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走出人生追求的低级趣味，中国足球怎么会腐败丛生、臭脚云集，又怎么会输给一个蕞尔小国。

诚然，竞技与权力共谋，绝非中国特色，西方社会政治同样存在。依据亚里士多德城邦生活即政治的观点，竞技本身是一种文化政治活动。正是伯德里亚引出的批判涵义，足球只有过于快活，才不至于承担舆论民众恶魔的责任。问题的关键是，经济状况、思想境界、城市品位这些因素产生的中西差距、国家差距、城市差距，直接决定了实践方式与行动结果。这里借用李力研的一个批判话语形象说明，日本一直在政治舞台上大出风头，决不是因为他的竞技运动如何发达之故，而是经济发达到了处处憋涨特想管点闲事的地步。犹同美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价值追求，国家战略的兴奋点完全放在了商业主义和国家认同两个方面，一方面打造世界一流的职业体育市场，一方面建构现代国家的感情根基。至于奥运会那些软金牌项目，可没脸面花费纳税人的钱，索性扔给市场和学校。反之，足球文化纵深植入欧洲社会的神经，以此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欧洲国家高层哪敢怠慢。再看深圳拒绝参加广东省农民运动会这个问题，换作别的经济落后地市，还不屁颠着去献媚，毕竟深圳的经

济状况、思想境界和城市品位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不需要过多金牌来证明自己的地步。

想想日常生活，对办大型运动会为什么有意见，为什么不开心。赔钱赚吆喝，跟着折腾受累，还得自费度假和限行出门，到哪说理去？中国办赛事不应在行动战略上走两个极端路线，不是一哄而上，就是一刀切。应当在内在价值层面上走两个发展道路，打造赛事商业主义和国家认同的“双轨制”，实实在在地为国家经济发展服务，为国家人民的幸福生活负责，促进中国文化经济与社会政治领域的发展繁荣。人民日报记者许立群关于“大型运动会是不是太多了？”的问题，我的答案是：中国有意义的赛事太少了，无聊的赛事太多了。

论构建多元化的运动会体系 符合中国国情

——兼与许立群同志商榷

张博

(天津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天津 300191)

近日，阅读到许立群的文章《每月一两个大型运动会是不是太多了》(详见《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8日)。读罢掩卷长思。作者提出的一些观点应该引起学术界和相关部门的注意，但有一些问题尚值得商榷。

1)制度层面、技术层面能够解决的问题，不应该成为否定中国举办运动会过多的论据。

作者在文中以“乱象丛生 触目惊心”为小标题，指出当前赛会中存在的4个主要问题：规模膨胀、办赛成本惊人；铺张浪费、资源无法利用；弄虚作假、赛风难以扭转；千会一面、观众审美疲劳。认为这些问题是浮夸之风的体现，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质疑，中国大型运动会及中国体育到了谋求变革的时候了。下面，针对上述4个方面问题，提出一管之见：

第一，制度上存在漏洞时，可以通过相应的新制度的建立加以弥补。在论证规模膨胀、赛会成本惊人时，作者提到“各类赛会规模越来越大，耗时越来越长。为数不少的东道主好大喜功、求全责备，以承办一届‘历史之最’的赛会为荣”以及各类运动会项目设置、参赛人数已经膨胀到最初的数倍等等。其实，于主办方而言，承办一届“历史之最”的赛会应该属于一种正常的心态，只有在不断的创新中，运动会的吸引力才能有效放大。无论是参赛人数还是项目设置

都不应该以人数多少来作为是否“注水”的标志,关键在于这些项目和参赛人员是否合理。从制度层面上说,对于申报主办大型国内外综合性体育运动会的区域(无论是省、直辖市、自治区还是单一的城市),提前对相关的经济指标进行考量,对相应的赛会规模进行总量控制,完全可以消灭所谓的“注水”的现象。

第二,建立合理的规则,是解决场馆浪费的关键所在。作者指出:“一方面我们拥有的超豪华、高档次的场馆数量堪称世界之最,一方面却是群众健身仍然缺乏最基本的场地设施保障。”其实,这两者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从群众健身场所来说,基本上是在社区内进行,大部分是户外运动。应该说,近年来,在城市的社区中,这样的健身场地并不缺乏,不知道该文作者是否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数据,这些数据是否有权威的统计和发布渠道。必须加以指出的是,群众健身与运动会场馆的合理“耦合”,是我们建设大型场馆的初衷,如何将这些问题在论证的过程中就加以解决,远比在赛会结束之后,场馆难以开放、难以利用,从而成为城市建设中的包袱,甚至为人所诟病要强得多。如果能够在申办运动会的同时,对于相关运动场馆建设,能够将“政府引导、市场行为、企业参与”这12字落到实处,也许大型运动场馆在运动会结束后的“空置”现象就会越来越少。在这方面,需要提前考虑运动场馆的维护和后运动会时期的运营问题。

第三,举凡技术层面能够加以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在论证弄虚作假、赛风难以扭转这一命题时,作者提出“同一名选手,换上不同的‘马甲’便能在各个运动会间成功穿越,时而学生、时而农民、时而工人,分身有术、造型百变。”除此之外,还有虚报年龄等诸多问题。无论是一人参与多种赛会还是虚报年龄等问题都是从技术层面能够解决的问题。目前在某些方面有关个人的资料都是全国联网的,主办方完全可以在报名后正式比赛前与有关部委合作,对参赛人员的身份和年龄问题通过上网查询,将上述问题解决在赛会开始之前。这样做,可能会增加一些赛会举办的成本,在扭转赛风的初期,这个问题的确存在。只要持之以恒,让钻空子的参赛人员没有空子可钻,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就能够逐渐消灭,还运动会一个干净、清白。

第四,关于千会一面、观众审美疲劳的问题,笔者想饶舌几句。这个问题,作者确实一针见血,指出了当下一些大型赛会开幕式存在的问题。但仔细想过之后,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文化与体育嫁接,是当下中国正在提倡的问题,如果仅仅是风格相近就否定了开幕式的文艺演出,似

乎不大合理;另一方面,没有哪一项运动的忠实观众会因为开幕式的表象而忽视赛会的内容,具体地说,没有谁是因为开幕式的花哨而去观看比赛的。如果认为开幕式的千篇一律或近似,就会造成赛会传播力和影响力的衰弱,从逻辑上似乎讲不通。

应该说,上述4方面的问题,只要有有关的部门和主办机构有决心制止或是改正,在相关的制度设计上,在相应的技术层面应对上,拿出切实的举措和办法,就能够加以解决。比如对虚报年龄和黑哨等问题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只要出现类似问题,立即处理,并纳入各类运动会的“黑名单”中,终生禁赛,不允许其继续参加运动会;对出现问题的相关单位责任人引入问责制等等。

2)构建多元化的运动会体系,关键要使该体系成为推动中国体育事业(包括体育产业)向前发展的动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在文章中提到了一些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比如,在幅员辽阔、人口稠密、民族众多的中国,应该举办多少运动会为宜?如何提升赛会的质量和效益?如何真正实现节俭办赛、让赛会回归体育本源?如何让赛会更有效地服务于中国体育事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等等。要探讨这些问题,往小处说,显然不是一篇论文能够加以解决的;往大处讲,也不是体育学界或是体育管理机构一两个层面能够加以解决的。笔者拟对中国构建多元化的运动会体系问题谈下个人观点。

究竟中国应不应该构建相对完整的运动会体系?检验运动会体系是否科学合理的标准又是什么?笔者认为,构建多元化的运动会体系符合中国国情,而检验运动会体系的标准就在于,该体系的构建要成为推动中国体育事业(包括体育产业)向前发展的动力。

首先,中国需不需要运动会?我想这个问题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就开始接纳并发展新式体育运动,并初步构建运动会体系的雏形。经过百年的社会变迁,体育赛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次运动会、一个比赛项目都可能引发全民性的体育热潮。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女排获得三连冠之后,神州大地上掀起了一股排球热;当中国选手获得奥运会跆拳道奥运冠军后,跆拳道又开始在中小学风靡。体育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传播力在中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其次,中国需要多少运动会?众所周知,现在的综合运动会以奥运会为龙头,之后为亚运会、东亚运动会、全运会。与此同时,按照不同层级的行政区划而举办的各种运动会正在蓬勃开展。从参加的人群划分有青少年运动会、少数民族运动会和农民运动会等

等。此外，还有很多特殊目的的运动会。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幅员辽阔、人口稠密、民族众多，因而，从保障各阶层、各民族参与运动会基本权益的视角出发，构建多元化的运动会体系显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再次，应该如何举办运动会？相对前两个问题而言，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更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者对越来越多的国际赛会落户中国给出了两点答案：一方面是大型运动会的综合价值和规模效应激发了各地的办赛热情，另一方面综合国力的提升也令更多的城市具备了办赛条件。但作者也对在中国举行的大型运动会过多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乐于承办各种赛会，似乎是在给世界体育更多的机会，一些并无特别吸引力或市场开发价值的赛会如果没有中国伸出援手，很可能面临难以为继的窘境，甚至认为中国正在世界体坛扮演一个拯救者的角色。我认为，中国不是世界体坛的拯救者，做好自己的事情，把本国的全民运动、全民的身体素质提高上去，这是一个关键。另外，申办、主办运动会，对于区域和城市的品牌推广价值远远超过其赛会本身带来的经济价值。对于主办大型运动会的省市来说，运动会的规模效应无疑是存在的，对区域和社会发展的潜在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毋庸置疑的。因而，从申办者的角度考虑，举办综合性运动会的热情是可以理解甚至是应该给予充分支持的。一如前文提到的，只要把申办综合性运动会的区域的经济实力、财政实力等问题综合加以考量，不难划出一个允许办赛会的经济底线。

中国的体育事业要发展，中国的体育产业要做大，运动会无疑对二者都有裨益。实际上，我们在讨论中国需要构建什么样的运动会体系时，必须明确一点，运动会不怕多而怕不精。所谓的精，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要借助运动会把体育产业做优做强做大；要借助运动会，把可以培育的未来具有一定市场前景的体育门类扶持起来；对于未来可能不会产生经济效益，但相关的体育运动需要培养，视情况而定，不能大包大揽，也不能完全不管。说到底，就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区分不同性质的运动会，区别对待相应的经济投入和经济效益问题。对于可以产生经济效益、能够拉动相关体育产业发展的运动，就算一届运动会投入几十亿上百亿，但通过商业化运作，比如通过电视转播权、特许赞助商等多种途径，成功回收这些成本，甚至产生盈利，大规模的投入还是值得的，但必须要警惕单纯追求“慷慨”二字不顾实际的做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的运动会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加以解决。同时，从中国内地的实际情况出发，需

要构建多元化的运动会体系。于世界体坛而言，中国不应该也没有理由扮演拯救者的角色。考量中国运动会体系是否科学的标准，就是看这种体系能否推动中国体育事业(包括体育产业)向前发展。

也谈运动会被“点名”

郭叶

(广州大学 体育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和深圳大运会的接踵而至，将体育作为国家公共事务的形象在大众视野中得到空前的强化。但盛会落幕，繁华散场之后，主流媒体给广州亚运城体育馆大门上已经生锈的大锁链的特写、对国内至少“一月一会”大型运动会的盘点、对数以亿计的各大运动会的投资帐单的清算，又都无不挑动着大众已经被迅速增长的生活成本和不容乐观的发展前景绷紧了神经，激起了社会对于“运动会”从投资到监管到效果甚至存在意义的一片质疑。

那么，“运动会”还要不要办，答案是肯定的。体育属于一种文化活动，其对于公众健康水平的提高、积极的社会氛围营造以及相关产业的促进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大型综合运动会的举办也正是政府为社会提供体育公共服务，创造体育社会效益的一种表现形式。而运动会“被点名”这一事件所暴露出来的正是政府在处理作为公共服务的体育时所面临的“失灵”困境，面对社会上质疑的声音，如何高效益地生产体育公共产品和实施体育公共服务正是体育公共服务部门的当务之急。

首先，要保证公众需求的充分表达，提高体育公共产品的供求均衡。大型综合运动会的举办无疑需要政府投入大笔的资金，大到国际赛事上百上千亿的投资，小到号称“最节俭”的全国智运会几千万的预算，其主要资金来源还是国家或地方的政府财政收入，换句话说讲最后“买单”的是作为纳税人的全体社会公民。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市场经济国家里，公共财政的决策主体，在本质上应该是公众，而政府只是决策的参与者。诸如运动会之类的体育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主要是为了满足大众的需求，而不是政府的面子工程、领导的工作业绩。同时，保证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均衡化则是满足公众体育需求的更深层次表达，运动会之所以饱受诟病，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在一场场豪华盛宴的背后，青少年体质的连年下降、远未达标的中小学体育设施、拥挤城市中少得可怜的公共运动场

地等的巨大反差。那么开不开运动会,开什么样的运动会,花多少钱开运动会之类的问题首先要做的是广泛听取大众的意见。建立体育公共信息公开平台,实行大型体育公众事务投票机制,同时引入社会监督体系,这也许是解决当前体育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的有效途径。

其次,加强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提高体育公共服务效率。现代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都表明,强调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加强政府与其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合作,可以有效地解决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低下问题,并且同时保证社会效益和公众利益。以大型综合运动会的举办为例,可以从赛前调研策划与广告宣传、赛事组织与志愿服务、赛后可持续项目的开展等环节引入各种非营利组织的专业协作,将政府精力更多的放在宏观调控、监督和考察评估上;同时,非营利组织广泛的群众基础更可以有效地扩大体育赛事的社会效益。而各级政府的体育主管部门也有必要下定决心扶持和引导体育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目前民政部在册的我国 2 万多体育非营利组织相对 13.3 亿的人口基数来说实在是太少了。当前的大型运动会更多是体育精英的比赛,高规格大排场把普通人挡在了运动场外,而真正能将大众召集到赛场上—显身手的运动会却少之又少,政府如果能够拿出一部分财政预算在培育和善用体育非营利组织上,借其之力帮助爱体育的普通人拥有享受运动和竞赛的机会,给更多还留恋在电视机前沙发上的人们一些走上绿茵场的理由,人民的体育事业将会得到更全面更健康的发展。

再次,深度开发体育的市场价值,以丰富体育公共产品的经济支持途径。体育作为文化活动,社会效益必然是其首要目标,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又具有商品属性,可以创造经济效益。再次以“被点名”事件的主角——大型综合运动会为例,无论是开闭幕式还是赛事本身,本应都是极具看点的文化盛会,但大部分运动会的现状却是关起门来比赛,自娱自乐,艳羡着诸如 NBA、皇马这样的外国大牌每次中国行都赚得盘满钵满的同时,却无力改变再添一笔财政赤字的结局。我们没有明星吗,我们的比赛不精彩吗,对于一个在奥运奖牌榜上已稳居第一阵营的体育大国来说,显然不是。那么运动会的造血机制究竟为何会被抛弃了呢?首先不得不提事业单位靠财政的惯性思维,组织者的经验多数还停留在“花钱”而不是“挣钱”上;同时,公共服务部门长期以来对“赚钱”的避讳,也阻碍着运动会之类的体育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市场价值的开发。事实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经济效益与公众利益已经不是不可调和的矛

盾,政府主管部门完全可以将富有市场价值的体育竞赛表演、场馆设施租借、广告冠名等进行深度开发,继而将所获得的利益全部用于保障、丰富、提升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具体的操作方式在此无需多谈,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案例早已有足够的科学和高效的模式供参考和借鉴,关键还是要转变观念,并且保证社会公众应该享有知情权和参与决策的权利,引入社会监督机制。

最后,建立体育公共服务全程评估机制,引导政府“花得更少,做得更好”。随着世界范围内政治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成熟,“以顾客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体系逐渐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其基本理论中所强调的对于公共服务进行绩效评估,可以帮助政府将对管理活动的关注重点从投入转向产出和结果,进而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体育公共服务的实践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政府部门多,社会影响范围广。再以大型综合运动会为例,从申办策划到筹备组织再到开幕闭幕,已经在财政、民政、城建、交通、公安、文化等等政府部门走了一圈。但是,面对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公众总不免提出疑问,庞大投资的预算清单为什么总是“不能说的秘密”,纳税人的钱是不是都用到了“刀刃”上。为了避免这种体育公共服务提供方“出力不讨好”、受众“不买账”的低效运行方式,建立全程评估机制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第一,对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进行评估,既然公共服务的目标人群是全体社会公民,那么往哪里花钱就应该先问问大家,大众不认同的财政投资要坚决砍掉,而呼声高的项目要全力以赴,从而确定提供什么样的体育公共服务和确定体育公共服务的消费边界;第二,对供给进行评估,通过例如公开招标或成本效益核算来决定体育公共服务的生产者和生产方式;第三,对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和生产结果进行监督和评估,包括对成本、产出以及效果的核算,而针对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可持续性,在产出与效果核算中不仅仅要包括对既得结果的评估,还要强调对其远期运行规划、实施情况、效率效益进行监督和评估。同时,在全程评估的过程中有必要做到信息公开化,导入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使公众、专家和政府三位一体,成为公共服务评估主体。

据悉深圳政府承诺争取在 2012 年底公布深圳世界大运会审计结果,期待这是个好的开始。

多中心治理与社会公共治理

——体育赛事运营管理的中外比较

易剑东

(江西财经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13)

中国的体育赛事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恐怕我们难以简单作出评判。通过几个数字，或许可以大体找到答案。

美国4大职业联赛的年均现场观众超过3亿人次，而我们的足球和篮球两个最大的联赛一年的现场观众不到800万人次。中国的人口大约是美国的3倍，这两组数字一比较，我们会说中国的赛事多还是少呢？

2001年以来，世界上各大体育赛事陆续登陆中国，据不完全统计，过去的10年中，亚太地区举办的非职业赛事大约已经占世界赛事总量的1/3。

21世纪以来，美国4大职业联盟的电视转播权费收入239亿美元。而中国的职业俱乐部目前几乎全面处于亏损状态，实现帐面盈利的俱乐部还没有出现。

应该说，这些年亚太地区赛事仍然在增加，尤其是一些综合性运动会越来越多，东亚、西亚、南亚、东南亚运动会一个接一个，而我们国内的全国性综合运动会也在13个以上。这些运动会举办的初衷基本都是增进国家和地区间的联系与友谊、为运动员提供更多比赛机会，很少顾及赛事自身的成本和收益、投入和产出。客观地说，运动会确实具有这些功效。尤其是处于发展中的中国，通过体育比赛促进城市基础设施改善和体育场馆建设，也是一种城市更新和国家、地区发展的可行之路。然而，如果运动会给城市带来沉重负担，运动会举办都被视为政治任务，为运动会兴建的体育设施赛后无法有效利用，必然带来资源的严重浪费和国家财政的沉重包袱，同时也会不可避免地引发社会各界对于赛事效益的普遍质疑。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中国的体育赛事是多了还是少了，但我们可以断定：没有人关注的赛事、风光一时拖累十年的赛事、赛后场馆无法利用的赛事，其举办的必要性肯定是要打问号的。从各种媒体报道的信息可以知道，不少地方政府举办赛事并没有严格的科学论证、民主决策、理性运营。赛事申办过程中缺乏专业人士的充分介入和科学论证、精细调研；缺乏广大公众的普遍参与和民主评议，部分决策是少数官员意志起决定作用。赛事举办过程中缺乏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

尤其是缺乏企业和社团的充分介入，政府部门在其中扮演着管办全包的全能角色。

西方发达国家是怎样管理体育赛事的？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呢？下面根据一些资料做一个阐释。

1)将赛事的体育目标和社会目标有机融合，因此赛事管理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

仅从数量上看，美国是世界上体育赛事数量比较多的国家，该国拥有大约20个项目的职业联赛，也是世界上举办奥运会、冬季奥运会最多的国家。然而，美国的职业联赛虽然具有浓烈的商业色彩，但却得到政府的重点支持。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对于参加职业体育联盟的运动队实行“反垄断豁免”，严格控制运动队的数量和其分布以及他们的影响范围。其目的就是要保证比赛的质量，不使其泛滥而没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此外，美国很多州和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视修建体育设施，并且以不高的价格提供给职业赛事使用。政府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职业体育比赛能吸引观众和企业投资，促进地区的商品销售和税收，从而增加就业机会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同时，优秀的职业运动队还能促进社区公民的社会认同，激发社区公民的自豪感。反观我们国内的职业赛事，特别是职业足球和篮球赛事，长期以来没有处理好与政府和社区、媒体、企业的关系，其影响范围往往局限在“体育界”或“体育迷”之内，只有体育目标和成绩追求，无法实现社会目标。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职业赛事难以获得政府的更多支持。而在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利用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体育场馆的建设，既有税收分流、税收担保，也有直接拨款。这种做法使得职业体育赛事顺理成章地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支持。

2)将综合性赛事的成绩与国家目标有机结合，通过赛事带动全国体育均衡发展。

从1967年举办冬季全运会和1969年举办夏季全运会开始，加拿大联邦政府每2年在全国境内的中小城市举办加拿大全国运动会，两者交替举行。如2011年4月举办了冬季全运会，2013年将举办夏季全运会。从奖牌榜上(加拿大全运会只按照奖牌数量而不是金牌数量排名)可以看到：12个参赛的省区在40多年来的全国冬季和夏季运动会上的排名基本没有变化，魁北克、安大略、不列颠哥伦比亚、阿尔伯特等始终处于前4名(仅有一次例外：1983年冬季全运会阿尔伯特获得第5名)，媒体也很少将一个省区的形象和面子与全运会的成绩挂钩来报道，而是站在全局高度讨论全运会上涌现出的优秀运动员今后的发展潜力，奖牌数长期处于最后3名的纽芬兰省、爱德华王子岛省、育空地区

也无须为落后而奋力加大投资去争取更好的成绩。

已经举办的12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和11届全国夏季运动会基本在12个省区轮流举办(1999年独立的第13个地区——努那伍特地区2007年开始参赛),尽可能均衡带动全国各地体育的发展,包括体育设施的兴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已经举办的23届加拿大奥运会中,东道主获得奖牌数第一的情况只有3次,分别是夏季全运会安大略1981年和2001年,冬季全运会1983年魁北克。可见,各省区之间没有我们那样激烈甚至扭曲的金牌争夺战。

加拿大政府举办全运会的官方目标是:为高水平运动员提供比赛机会,促进体育发展;促进国家的团结与统一。为此加拿大还成立了“全运会理事会”,由联邦政府,体育组织和省、市代表组成,负责处理与全运会有关的事宜。当然,全运会的经费也主要由联邦政府承担,在1991年之前,每届全运会联邦政府拨款大约为400万美元(根据笔者大约10年前看到的一份材料,我国举办全运会国家财政补贴至少是这个数字的2倍。而省市的投资更大)。全运会的长期轮流举办使各省区政府愿意大力发展体育队伍,大多数省政府都与省内的体育组织一起,提供资金和人力来培养运动员。全运会的另一个积极影响是促使中小城市修建了大量的体育设施,并且这些设施事先就充分考虑为赛后大众参加体育运动提供便利。加拿大不少专家认为,与其在大城市为重大国际比赛修建大型体育场馆,还不如在各地兴建一些赛后便于百姓锻炼的场所。

3)将赛事的政府责任和运营管理有机整合,努力实现赛事的管办分离。

目前世界上的7大经济体,除英国和中国因为气候、地理等原因没有举办冬季奥运会,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都已经全部举办过。中国还是世界上7大经济体中唯一没有举办过世界杯足球赛的国家。然而,世界杯足球赛恰恰是辐射城市最广、直接收益最大的赛事。笔者以为,这其中固然有中国足球水平落后和冬季运动比赛场地离冬季奥运会的要求有一定距离的原因,但更加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我们不擅长赛事运营,甚至不大愿意把赛事看成是可以赢得经济收益的活动。往往过度强调赛事举办的政府职能,在鼓励民间社团、企业和各类公益组织参与方面被动和消极,甚至习惯于采用行政强制手段进行赛事管理。

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

法国政府一般不介入体育赛事的经营。法国的1998年世界杯组织委员会在1993年只有不足10名带薪人员,1996年增加到450人,1998年7月31日足球世界杯比赛结束2周,组委会就宣布解散。可以说,

1998年法国世界杯完全依靠一个临时性的民营公司运营。当然法国政府也不是都撒手不管,主管体育的青体部将主要投资用于营造社会气氛、外交活动和修建场地设施。

英国体育理事会把从政府获得的彩票资金分配给2级体育理事会,其中主要用途之一就是举办大型比赛。英国政府还创造性地制定了“体育配对”计划,即赞助商赞助某项比赛,英国政府拨出相同数量款项资助赛事,这就是所谓的“1英镑对1英镑”政策。在这种政策导向下,英国的体育赞助大多流向了少数能带来高回报的运动项目——网球、足球、橄榄球和板球等。1990年全英国的体育赞助大约2.1亿英镑,50%集中在足球、赛车、赛马和高尔夫,近年来这一数字不断攀升到近10亿英镑,但依然集中在一些市场大的项目。

此外,地方政府往往要求开发商在开发计划获得通过前必须规划体育设施,哈姆希尔郡就要求开发商在土地开发过程中,必须要修建足球场、保龄球馆、俱乐部用房和儿童游乐场,费用由开发商支付,并且保修1年,建成后,这些设施要移交给地方政府。

西班牙在1992年奥运会后进行反思,政府出面把一些大型体育设施交给私人企业进行经营,以缓解政府修建的大型体育设施赛后维护出现的严重亏损。

在瑞典,内政部每年把体育经费的绝大部分直接下拨给瑞典体育联合会,对于组织国际比赛,政府往往只提供启动经费,其他经费由赛事组织者通过市场开发获取,政府有时会推出一些税收减免、彩票发行等政策来弥补大型赛事的经费不足。

总之,西方国家没有政府包办国际赛事的传统和体制,而是善于调动包括企业和社团在内社会各界的力量,共同推进赛事的举办和效益的提升。

处于发展中的中国,以及中国的很多省市,或许还需要通过国际体育赛事提升形象、实现城市更新与转型,这是西方很多国家已经走过的路。对于后发的中国来说是否举办体育赛事,笔者以为:科学论证、民主决策、理性举办,应该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国家仪式的重构

——对中国体育赛事密集现象的诠释

路云亭

(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上海 200241)

我始终认为,在中国举办的各种体育赛事是所有中国人乃至全体海外华人的节日,这是一种国家仪式,

是民族同心的象征。有鉴于此，不应讨论其存世的合理性。这是问题的关键。

2008年以后的中国人是幸福的，近距离地观赏、体味、把玩到了来自欧洲文明发祥地的奥运会比赛事项，附带感受了一次有关奥运会的一整套的文化和文明形态。2010年，广州又为大众奉献上一届蔚为壮观的亚运会。2011年，中国人又品尝了在深圳举办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中国人终于真切感受到了做一位中国人的伟大之境与快乐之情。

中国人生活在盛世的时代，享受到了以前数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快乐。中国人不仅在各种大型体育赛事的观赏活动中享受到了盛世的电气声光、连云欢歌、还在如梦如幻的境界中感受到一种大国国民的恢弘气势，感受到了国家强盛所带来的身体性和精神性快乐。

这种快乐一直延续到2011年的秋天。然而，一种激进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思想也随即浮现。事出有因，《体育学刊》编辑部给了我两则新闻，一则是许立群刊登于2011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的文章，质疑中国近年来的大型运动会是否举办得太多了，另一则是2011年10月25日的《京华时报》引述《南方都市报》微博报道，报道说到深圳市拒绝参加2011年10月20~28日广东省第二届农民运动会。

坦言之，这两则消息并不新鲜，似曾相识。质疑运动会的文章我最先是在网络上看到的。只要翻阅一下各家网站，大量质疑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和各级政府工作合理性的言论并不少见。因此，《人民日报》的文章一下来，我的第一印象是国家大报的观念不应因袭网络论点。

许立群的文章题目是《大型运动会是不是太多了》，作者对中国每月举办一两个大型运动会提出质疑。作者对体育圈内的事情十分熟悉，文章使用了“喘息”“休整”等词语，感到这仍是一份深受战争思维影响的文稿，似乎体育赛事还和打仗一样，具有紧迫性和危机感。但我很难对文章的观点产生认同。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体育赛事的举办者和观赏者有共同利益，但在休闲建设和休闲享受方面，两者是对立的，体育赛事的举办者既然要举办一场赛事，必然要付出很大的劳动。但是，它对观赏者来说，则是体味一种高品质的休闲活动。因此，对一大批观赏体育赛事的普通中国国民而言，大型体育赛事则无疑是一种值得观赏的盛宴，但是，观赏者也是基础国民，他们在自己各自的领域已经付出了劳动，并且绝大多数是合法的纳税人，无需再为提供享受服务的机构反复致谢，并以体验者的姿态陈述其举办之苦楚。可见，作者显然不太理解休闲学的基本规程，并漠视了休闲

业的运作方式。文章还说：“赛事密集摩肩接踵，某种程度上，中国正在世界体坛扮演一个拯救者的角色。”作者认为中国的体育赛事几乎成为一种风气，并进而认为：“放眼全球，亚洲是拥有最多综合性运动会的地区，若论国家，则以中国为最。”

客观地说，比起2008年以前而言，中国举办运动会或许相对有点密集，但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因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一定是节庆日繁多的国家，这理应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常态。何况，中国在步入盛世，一切有关盛世的仪式都需要从点滴做起，并且循序渐进，发展壮大，因此，我认为类似大型体育赛事之类的活动，在中国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甚至不妨说还少得可怜。试以举世闻名的古代罗马帝国为例。它的节庆日数量可以为同为大国的中国提供参考。

据英国学者纳撒尼尔·哈里斯著的《古罗马生活》记载，古代罗马帝国经历了王政、共和和帝国3个时期，古代罗马人分为两大阶层，一是包括国王、官员、教士、骑士和自由民在内的贵族和平民阶层，另一则是奴隶阶层。作为实力强大的帝国国民，罗马人最大的爱好便是寻求节日的快乐，这一点导致了后来盛行于欧美的享乐主义。但是，罗马式的享乐和东方的不同，往往具有彻底的欢乐元素。古罗马的帝国时期，节日娱乐活动几乎成了平民阶层的日常活动。每年的运动会由原先的8天改为16天，古罗马的宗教性节日更为繁多，其中3月15日是岁序女神节，6月13日是封斋前的礼拜节日，有连续3日的庆典活动。其余如牧神节、基利努斯神节、农神节、俄普女神节、圣像节等，都是很经典的节日。而最具有狂欢色彩的是每年12月26~29日的小丑节。那几天内，罗马人的贵贱等级暂时性消失，通常情况下，神甫会当选为小丑，在狂欢氛围的簇拥下，庄严的弥撒变作了一场临时的闹剧，平民获得了充分的精神宣泄和彻底的狂欢享受。古罗马王政时期的节庆日最为繁多，每年的节庆日超过了175天，即便共和时期，每年的节日也有120天之多，古罗马人几乎是两三天就过一次节。古罗马的节日庆典文明对后世欧洲和美洲有深远的影响，如农神节发展为欧美的新年节日，庆祝方式演变为宴会和化妆舞会。小丑节虽然已不存在，但并未彻底消失，而是转移、演化成为狂欢游行，变成了欧洲狂欢节的源头。

说到此，我们应当知道，大国的情怀、大国的意志、大国的体面、大国的排场通常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得以确立的，毫无例外的可能。近世学者常常以“好大喜功”等词汇来批判中国古代如汉唐等大王朝的皇家做派，这显然是对古代罗马帝国、欧洲乃至中国的

历史缺乏深刻理解的表现。

2011年的体育赛事扎堆现象,充其量仅属于国家体育总局和地方各级政府沟通不畅的问题,即便真的因为出现了密集赛事现象,也自有其积极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因为大型庆典性节日在中国文化里历来属于喜事,依照儒家习俗,但凡喜事都具有无以撼动的文化统治力。比如中国人在过年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说不吉利的话语,因为说与喜事无关的话会触犯中华民族的最大的禁忌。因此,当我看到各种对体育赛事持否定态度的文章后,第一印象便是认为这些人说了很多不吉利的话。在一种喜庆的时期,本不可徒然萌生悲观情绪。

从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开始,中国的确掀起了举办高水平运动会的浪潮。这些赛事看似繁多,但很多是历史的欠账使然。请问,我们在长达百余年的时间内做过几次像模像样的国家性庆典!而如今国家在具备了财力、物力和人力的前提下,补进一些国家仪式,难道一定是一种过错吗!否定者显然对中国百年的屈辱史缺乏必要的记忆。

中国如此如火如荼举办体育赛事,完全出于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国家仪式文化重建工作的需要,其目的就是重塑民族信心,重建大国形象,重立权威仪式,重修民族价值观。正因如此,我对中国举办大型运动会的情况一直抱有一种理性的体悟。

我对在中国举办的所有的运动会持赞成态度,因为我在其中看到的是光明、正大和正确的观念性、信仰性甚至宗教性力量,而非其他。应当说,这里蕴含了一种感化民族共同体成员的教化的力量。因此,中国举办体育盛会完全是出于一种教化选择的立场。因为依照目前中国的国情,如果没有政府出面组织的各级运动会,中国人会活得更为沉重,也更为艰辛。试想,如今的中国所以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经济成绩,皆仰仗中国人民的辛苦劳动。过去我们的教科书一直在说中国人民具有勤劳、勇敢、智慧的品质,我们感受淡漠,因为我们没有与之匹配的直观的仪式行为,但是,现在只要抬眼看看各种仪式里所蕴含的丰富细节,再看看中国每个城市、乡村中的人群内匆忙的步伐,我们知道了中国的经济崛起并非凭空造势,恰是真实的拼争而得。因此,一切犹如古礼所指向,国家不应亏待勤劳的百姓。而由国家出面举办这样集文艺、竞技、娱乐于一体的大型赛事,可以很好地为中国最基层老百姓解决娱乐难的问题。事实表明,中国举办如此多的体育赛事一定是有因有果,顺理成章的。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余年了,努力拼争了30余年的中国人终于在2011年一跃而起,换来了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的名号。按照中国的国情,参照中国近代以来遭受西方列强欺压的历史,国家理应举办一个或多个仪式,借以告诫国人,警戒世人,并向曾经欺压过中国人的列强作出一种象征性宣誓。又鉴于中国百年的屈辱史的严重性,中国人无论多么超脱,也应当补上这种国家仪式。因此,代表中国国家意志的最高等级的仪式一定要举行的。

但是,或许是鉴于世界上尚有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持莫名其妙的猜忌和不友好态度,中国人终于将这种本来应该严正举办的仪式作出了临时性的变通处理,将公然的大国宣言降低到体育赛事的规格,借以顾及少数国家对大国情怀的疑忌心理。但是,国人举办仪式的集体冲动始终未曾磨灭,于是,新的仪式集群就此崛起了。中国在近期举办大密度的体育赛事,恰是在这种经济性和政治性仪式匮乏前提下的替代性产物。

只要仔细地观察就会知道,中国举办的体育赛事和别的国家举办的体育赛事不同。其中最大的特点是强化了其中的仪式成分。中国是大国,毫无疑问具有对其他仪式的改良和同化能力。因此,中国的体育赛事并未朝纯体育化的方向发展,而是朝着越来越复合化的路径迈进了。这种同化力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已经有所显现。中国投入了几乎是举国之力,并非仅仅为了捍卫奥运会的尊严,而更主要的是捍卫中国的国家尊严。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种体育组织的国际奥委会在那个瞬间和北京以及中国民众紧紧地走在了一起。当年奥组委成员对一小撮藏独分子的捣乱同样义愤填膺,那是一种真诚心理的表现,因为大家都在办喜事,却有人故意要办一件悲事,那个时候,中国和奥组委必然走到了同一条大路上。

仔细观察会发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仪式已经强化了文艺和体育不分家的格局,随后的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都延续了这种办会模式,甚至朝着文胜于体的方向跨进。由于亚运会和大运会本身的影响力不及奥运会,因此,亚运会和大运会仪式中文艺的价值逐渐压倒了体育的价值。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变化。只要回顾一下广州亚运会开幕式即可知晓,其大型的文艺活动就极富表演性和创新性,几乎可以达到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等高的水准,其价值也足以压倒亚运会所蕴含的体育价值。这就是仪式改良。借助亚运会或别的体育赛事,来完成中国的仪式程序。

中国的仪式匮乏还有特殊的原因。中国是无神论国家,中国的这种无神论国家的国体可谓源远流长,因为儒教不信神。但是,从历史上看,无神论国家作为一种国体毫无疑问可以成立,而且发展良好,但是,

人类进化到现在，每个个体的人的心理复杂程度已难以估量，而集体的心理变化就更是难以考量，正因如此，宗教或信仰必然要走进每一个族群的心灵深处，并在每个族群的心理深层隐藏下令人难以捉摸的情感、想象、记忆和意志等因素。中国的成语里仍有很多词汇是专门形容这些因素的。如“人心叵测”、“知人知面不知心”、“不见黄河心不死”，可见人心是最难以让人洞察的存在物。其实，人心无法洞察并不可怕，因为还有宗教和信仰存在于中国，唯有宗教或信仰才可以为那些集团性人群漂移不定的心理活动找到栖身之所。人类拿什么来窥视、洞悉掌控之下微妙的集体心理变化，唯有仪式。

中国也的确如此做了，并正以复合性运动会的形式为 13 多亿人的超大型集群寻求内心世界稳定的巨大空间，并借此向已经开放的世界证明自己的新身份。其中隐含了中国人一贯的思维特性。至于许立群所说的运动场馆的使用不充分的问题，我不想从体育的角度谈，仅从宗教建筑的角度看，这些场馆显得还是太少了。

应当清楚，自从 20 世纪初以来，中国城市、乡村的所有文庙、武庙等宗教建筑经历了两次拆毁高潮，第一次是五四前后，兴办新式学堂占用和拆毁了大量庙宇；第二次则是文革时期，以破“四旧”为名，干脆彻底地拆毁了数以十万计的承担过民族记忆功能的空间场域。如今，中国境内绝大多数的本土宗教建筑已被拆毁，迫使国学以及大量民间信仰失去了空间性和仪式性依托。而失去了民族和国家仪式的后果十分严重，如若干年前结束的文化大革命，其生发点有多种原因，但国家仪式场域的拆毁，国家仪式制度的缺失，使得国民失去了心理重心，误将批斗、武斗当成了新的仪式。这实为促成文革爆发的文化学缘由。而这些仪式场域和仪式程序的毁落式空缺由什么来填充？我认为就是当今大批量举办过大型赛事的体育场馆群以及其他的观剧性场所。

国家大兴土木做体育场馆的建设，完全是一种恢复国家信仰的策划，而早已超越了纯粹体育运动的领域，更是对过去拆毁庙宇现象的一种很现实的政策性补偿行为。换言之，体育场馆的投资属于中国的宗教建筑投资，若以此标准来计算和评估，代价则并不算昂贵。

体育是身体的运动形态，而赛事却是仪式的存世形态，中国举办的各种大型体育赛事更是将体育赛事民族化的一种尝试，乃国之重奠，是历来之民族精神凝聚场域。非常之器，无须非议。

我们需要多少大型的运动会？

张军献

(江西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江西 南昌 330099)

我们需要多少大型的运动会、是否有必要成为世界体育的拯救者、哪些城市有资格举办大型综合性运动会，这些问题，都不是草民能够决定和控制的。正如有作者所说：“国内综合性运动会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复杂的竞赛体系，十几个大型赛事分别归属于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农业部、中国残联、国家民委等不同部门，具有不同的目标和任务。”现在停办哪个运动会都会牵扯诸多部门的利益，并且许多运动会并不是由体育部门管辖。因此我们需要由更高的权力机构对于当前竞赛体系进行权衡和取舍，最终拿出一个可行的改革方案。这不是单靠体育部门就能够独立解决的。

规模膨胀、办赛成本巨大，显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目前国内的大型综合性运动会显然比奥运会小很多，创下参赛人数历届亚运会之盛的广州亚运会参赛运动员人数不足万人，与奥运会的参赛规模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并且奥运会即使有“瘦身”的计划，但是与其创立之初的 14 个国家 311 人相比还在逐渐膨胀。有些项目如棒球被淘汰，马上有高尔夫和橄榄球被新增。并且为了确保男女运动员的比例均等，奥运会在不断增加女运动员的名额。所以认为奥运会在缩小规模只是一种假象，而要求规模远不及奥运会的其他综合性运动会缩小规模更是一厢情愿。如果不是经过举办全运会的历练，广州、上海、南京等城市如何能够承办得了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正是经过了全运会的考验，交通、接待、环保、安保等各方面才完善起来，才能够应对大场面。

办赛成本问题通常是不需要考虑的问题。以国家体育总局来说，只是负责分包各种赛事，各个地方获得举办资格之后通常需要自筹经费。国家只是给予数量有限的资助，更多需要地方去寻找财源。因此举办赛会的几十亿、上百亿的投入是不需要来自国家体育总局或者中央财政的拨款。一些大型体育赛事已经实现了多渠道募集资金的良性运作。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权、赞助、门票销售等已经能够应付所有的支出并且略有盈余。北京奥运会收入 16.25 亿美元，支出 16.09 亿美元，盈余 1 600 万美元。广州亚运会的支出仍然没有公布，但是有报道称亚运投资将为广州带来直接和间接经济收入超过 8 000 亿元人民币，亚运会直接投资加上亚运城建设投入，将为广州额外增加地区生

产总值1 032.4亿元人民币;亚运会间接投资将会为广州额外增加地区生产总值7 120亿元人民币。正是由于巨大的产出,所以上百亿元的惊人投入真的是不在话下。做慷慨的东道主是中国人一贯的风格。魏纪中都说“钱是在北京市运作,国家并没有投入太多的钱。国家主要是投体育总局的那几个场地。”有市场价值的赛事自然有足够的赞助,需要的是放手交给市场来运作即可。

运动会让城市脱骨换胎。提起办运动会,大家都觉得是烧钱。北京举办奥运会投资3 000多亿,广州办亚运会总投资1 200多亿,南昌办城运会投资500多亿。这些投入主要用于场馆建设和维护、运动会的会务费、城市面貌和环境的改善。其中最大的支出是在第三块,广州用于地铁建设、城市道路、桥梁和基础设施、环境综合整治、工业污水治理等经费达到1 090亿元;南昌市也以城运会为契机,推动城市的发展,实现城市形象的提升。2009年,南昌市政府投入950亿元,启动建筑街景的综合改造、园林绿化、城市道路改造等工程;加快推进城市轨道交通、昌北国际机场改扩建、昌九城际铁路、赛事配套场馆等42个项目的建设。虽然赛事只持续10天,但是带给南昌的改变却是永恒的,是不能用投入的数字预算来衡量的。城运会带给南昌的是环境的改善、生态的改善、人文环境的改善,是以体育带动整个南昌经济的发展。运动会的举办对于城市形象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提升,无论市容市貌还是硬件软件方面都有质的改变。

修建场馆铺张浪费无从谈起。大型赛事需要一定数量的体育场馆,但是并不意味着铺张浪费。一个城市需要有标志性的建筑,体育场与图书馆、博物馆一样都是属于文化设施,是城市的灵魂。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在规划的新市政府周边修建了图书馆、博物馆,还有著名的江湾体育场。修建于1934年的江湾体育馆可谓硬件先进、奢华高档,号称“东亚之最”。如今再看已“年逾古稀”的江湾体育场仍然不比容纳数万人的各种“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差。想当年江湾体育场也是立于偏远的郊区,属于不毛之地,如今随着城市的扩张五角场地区已经无比的繁华,江湾体育场也成为了具有历史价值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些举办大型赛事的城市已经本着节约的原则,将许多比赛放在地市举办,利用各地已有资源。在场馆建设方面江西南昌举办城运会就是坚持节俭办赛。首先全省设立9个赛区,南昌与九江、萍乡、新余、宜春、井冈山、景德镇、鹰潭、瑞金等8个城市共设赛场。南昌只新建了4个场馆,分别是国体中心、奥体中心、水上运动中心、射击中心。其余都是尽量对

现有的场馆进行翻修,或者利用高校的体育场馆资源。此外,场馆的规划主要是为了带动城市的扩张。由于老城区面积太小,10多 km^2 的范围居住了60多万人,借助城运会的契机,修建国体中心和奥体中心构搭了城市发展的框架,有助于形成现代化大都市发展新格局。新建的4大场馆中,江西省奥体中心和南昌国体中心为其中两大重要的综合型体育场馆,前者位于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昌东高校园区内,地处南昌的东部;后者位于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角洲片区,地处南昌的西部。不难发现,新的体育场馆和基础设施大多建在南昌城市发展和扩容的新节点上。

大型场馆的赛后利用不是问题。场馆的赛后利用的确存在短期的问题,如位置偏远、运营成本高等。但是关键要看它的投资人是谁。对于公益性的组织,主要是一个管理的问题;对私人性的组织,主要是经营的问题。如果完全是私人投资的话,那当然是营利性的,否则他私人干嘛投这个钱。如果是国家、国有企业在投资,则应有相当比例的公益性。只是作为普通百姓,我们不知道谁是投资的主体,只是看到这些场馆都修建了铁栅栏。并非服务于竞技体育的场馆就不能为群众体育服务,而是场馆并没有对外开放,或者说是人为地造成闲置和浪费。如果是公益性的面向所有人开放,一定会爆满的。

南昌新建场馆的赛后利用实际上早有打算:奥体中心将申办中超足球比赛;国体中心将引进参观、酒店,还要开酒吧一条街,建真冰场;水上运动中心除了承办国际国内赛事外,还会建设一个露天的汽车营区;射击中心将设立射击俱乐部。其中水上活动中心将成为市民休闲的乐园,由水上娱乐池、儿童戏水池、游泳池、漂流池等水池组成,成为南昌最大最全的水上活动中心,为市民提供娱乐、健身的服务。当然这还仅仅是计划,我们希望上述方案能够落到实处。

弄虚作假并非体育独有。如今提起体育中的造假的例子不胜枚举,身份造假、年龄造假、比赛假打、裁判黑幕等等,似乎体育领域已经成为腐败、丑闻的重灾区。事实上体育不过是社会的折射,任何社会中有的现象都会在体育中反映出来,体育界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所以任何社会上的不良现象,体育领域中无可避免都会存在,这是无法避免的客观事实。但是当批判体育领域的诸多丑闻和黑幕的时候,是否放眼看我们的身边,贪污腐化、诚信缺失、食品不安全、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污浊的环境决定了本该是讲究公平竞争、运动家风范的体育做不到出污泥而不染。所以对此,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千会一面,并不一定造成审美疲劳。随着奥林匹

克运动以势如破竹之势席卷全球，奥运会项目也摧枯拉朽般将其他的竞赛项目挤到了边缘。所有的运动会都模仿奥运会，从项目的设置到赛程的安排，从圣火传递到开闭幕式的演出等等。但是即便如此，每一场大型的赛事仍然在寻找突破，在努力创新，在寻找独有的风格，逐渐完善自己的文化内涵。经过 100 多年的发展，奥运会有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组织体系、内容体系，很难说经过时间的沉淀其他运动会仍然是对奥运会的简单模仿。我们承认有些运动会的会歌旋律不优美，歌词缺乏内涵，但是也有一些会歌让人听了热血沸腾，最终广为传唱历久弥新。如奥运会会歌中的《手拉手》、《登峰造极》等。开闭幕式的文艺演出也使体育与艺术实现了完美的融合。借助文艺表演可以很好地展现赛事举办地的历史和文化，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悉尼奥运会开幕式让我们领略了澳洲土著文化的悠久，雅典奥运会的开幕式带我们回顾了希腊海洋文化的发展历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则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即便我们忘记了金牌选手，但是我们忘不了这些精彩的文艺演出，他们已经成为大型体育比赛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南昌城市运动会的开幕式同样采用了大型群众文艺表演形式，融入绿色生态、红色井冈、八一精神等元素，分为《仙阁临风》、《红色记忆》、《绿色交响》、《超越辉煌》4 个篇章。相比以往城运会、七城会历史感更加厚重，跳跃式的、大写意的、艺术化的、经过升华的展现江西人民的风采。而在“绿色”的部分，鄱阳湖、婺源、瓷都景德镇，这些江西生态文化的名片也都会得到展现。以青少年为主力军的开幕式表演，营造出青春的热情的活力，呼应城运会的办会宗旨。许记者说的一群创作人员赶场子，只说明国人的创造能力不足，郎咸平将其归因于房价太高。

乱象很多，却只是表象而不是根源。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体育制度，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国家的政治制度。有没有必要办这么多运动会，不是每个普通老百姓说了算的，甚至是否需要办运动会都不是普通人能够决定的。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得益于国家力量、政府的保障，这个国际奥委会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否则离开了政府的支持奥运会不可避免走向经济化，最终可能会办不成。申办 2016 年奥运会的过程中，奥委会要求申办地政府有财力保障，巴西派了央行行长，结果他们赢了。美国芝加哥只派了市长出席，他不敢保证，因为它有议会，议员不同意市长就不敢轻易做出决策。最后这个市长硬着头皮签了保证书，结果回去之后遭到民众反对，认为他越权，说纳税人的钱你怎么能瞎花呢？

赔钱的买卖是没有人做的，如果地方政府举办运动会要赔钱，只能说明他们花的不是自己的钱。每个人都是纳税人，却无权支配自己缴纳的赋税。选出的人大代表自己都不认识，他们怎么能代表自己的意愿？财政预算需要经过人大的审议，但每笔钱的支出是否经过人大的批准就不得而知。政府采用高税收的方式获得财政收入，目前中国人承担的税收有近 30 项。并且税收非常不合理，普通收入居民成为税赋的主要承担者。土地国有并且建筑的使用权只有 70 年，政府通过卖地的方式大肆敛钱。国家限制政府的税收或者财政收入用于修建楼堂馆所，限制政府办公人员改善办公条件，那么多钱往哪里用呢？只能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于是道路的改造成为目前中国各级政府最热衷的工程。道路修通到哪里，哪里的地价房价就会随着上涨。而隔三差五翻修一下基础设施，GDP 就上去了，政绩也就出来了。这样的事情何乐不为呢？我似乎看到了体育场馆周围地价的飙升和房价的飙升。

